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围师必阙”与“围师无阙”

——从军事行动目的看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

郝敬东, 吴如嵩

(军事科学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孙子兵法·军争篇》讲“围师必阙”, 强调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银雀山汉简本“必”作“遗”, “围师遗阙”。“必”, 强调必须留下缺口; “遗”, 强调虚留缺口。这一字之差, 体现了作战思想的发展变化。从军事行动目的的视角考察我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 可以看出, “围师必阙”是西周军礼的遗风, “围师遗阙”是春秋兵家思想的渐变, “围师无阙”是战国之后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追歼穷寇”是实现战争胜利的最终要求。今天, 梳理和总结这一作战思想发展演变过程, 对于更好地达到军事目的, 保存己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削弱对方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从根本上和全局上赢得战争胜利, 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孙子兵法》; 军事目的; 围师必阙; 围师遗阙; 围师无阙; 追歼穷寇; 作战指导思想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1.002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是一切军事原则和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然而, 《孙子兵法·军争篇》却讲“围师必阙”^①, 强调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银雀山汉简本“必”作“遗”, “围师遗阙”。“必”, 强调必须留下缺口; “遗”, 强调虚留缺口。可以说, “围师必阙”是西周军礼的遗风, “围师遗阙”体现了春秋兵家思想的渐变, 到战国之后“围师无阙”就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追歼穷寇”是实现战争胜利的最终要求。今天, 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复杂严峻。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传统安全威胁持续高发, 新兴领域安全挑战日益突出……研究这一思想, 从根本上和全局上

赢得战争胜利, 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围师必阙”是西周军礼的遗风

公元前 638 年, 宋、楚两国相遇在泓水。此时, 宋军已排列布阵, 而楚兵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说: “楚军人多, 我军人少, 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河, 赶紧下令进攻。”宋襄公说: “不可以。”待楚军渡过河, 还未摆成阵势, 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进攻, 宋襄公说: “还是不可以。”等到楚军摆好阵势, 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 宋军大败, 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战后, 宋国人都怪罪宋襄公的糊涂。但是,

^① 《孙子兵法》有不同版本, 主要包括: 曹操的《孙子注》版本, 即《孙子略解》, 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孙子兵法》注解本; 《武经七书》版本, 最早著录于尤袤《遂初堂书目》, 称为《七书》;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版本, 这是目前广为流传, 校勘者多据为底本, 所谓十一家, 即曹操、孟氏、李筌、杜佑、贾林、杜牧、陈皞、梅尧臣、王皙、何氏和张预; 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竹简本, 于 1972 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被发掘出土; 此外, 还有日本《古本孙子》樱田本。这里采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1 年影印本)。

收稿日期: 2025-12-06

第一作者简介: 郝敬东(1982—), 男, 山东巨野人,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战略思想史研究。

E-mail: 15911057837@sina.cn

宋襄公满脑子“仁义礼信”和陈旧用兵的教条,他不服气并辩解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是徒有虚名的“慈父”,也是有原因的。从当时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在奴隶制时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它是军礼规范的作战原则之思想基础。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所谓“古者,争义不爭利”(《司马法·仁本》),核心的问题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的“勿事诈术”的作战指导。结果就是2000多年来,这一战争也一直被传为笑柄。毛泽东这样评价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1]321}

这一战标志着西周以来“礼仪之兵”的终结和“诡道”用兵之法的开启。

为什么这样说?这之前,作战样式是密集大方阵,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羊传·桓公十年》)。我国自夏朝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到春秋时代已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历时近2000年。奴隶主阶级在实行政治统治时有它的一套典章制度,这就是所谓“礼制”。夏礼、商礼今天已看不到了。西周时,周公在继承夏礼、商礼的基础上制礼作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周礼。周礼一般分为五种:祭祀时用“吉礼”,丧葬、凶荒用“凶礼”,朝聘会同用“宾礼”,吉日喜庆用“嘉礼”,命将出征用“军礼”。“军礼”就是军事上要遵循的典章制度,内容自然相当广泛,大凡治军、作战、国防建设、武器装备都在其范围之内。

这里,从作战指导的角度看一下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军礼。现在存世的《周礼》中周初的礼乐制度记载得很少,多是春秋时代的东西。但是,《司马法》却保存了不少军礼方面的内容,值得珍视。《汉书》指出,自“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四库全书简目》认为,今本《司马法》“三代遗规,往往于此书

见之”。班固或许也是有鉴于此,把《司马法》列入《六艺略》的“礼书类”。这里,笔者列举两例进行说明。

一是闻丧不伐。《司马法》讲:“战道……不加……所以爱其民也。”(《司马法·仁本》)就是说,按照军礼的规定,诸侯列国之间进行战争,如果恰逢敌国国君逝世,那么就应停止战争行动,班师回国。《左传》记载:“晋士匄侵齐,及穀(今山东东阿县南之东阿镇),闻丧而还,礼也。”(《左传·襄公十九年》)晋军班师回国,便是因为齐灵公突然病逝。杜预注指出:“详录所至及还者,善得礼。”认为之所以详细记述这一事件,正是由于它符合周礼的缘故。

相反,如果哪一个诸侯国违背了“闻丧不伐”的礼制,那就要受到谴责。《左传》记载吴军乘丧伐楚事,当年楚共王去世,吴军乘机伐楚,楚将养由基、子庚憎恨吴军公然违背有丧不伐的礼制,于是奋起自卫。养由基对子庚说:“吴乘我丧,谓吾不能师之,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同意。楚军与吴军在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交战,结果,楚军“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不善、失礼),《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左传·襄公十三年》)《左传》引用的《诗经》这句,意思是说,苍天认为你(吴国)不善,因此,你的国家就会祸乱不断,不得安定。

二是处险不薄。典型的的就是宋襄公的“四不主义”。《韩非子》记述宋襄公说:“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伤害伤员)、不擒二毛(不俘获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推人于险(不制敌于险隘的死地)、不迫人于厄(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可以说,宋襄公的“四不主义”是奴隶主贵族腐朽落后的作战思想的集中反映,他自己最终也成了奴隶主贵族军礼的殉道者。

处险不薄的“四不主义”不是一个孤例。关于“不重伤,不擒二毛”,《淮南子》就讲:“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淮南子·汜论训》)继宋襄公泓之战后的鲁文公十二年(前615),秦晋河曲(今山西永济南)之战中,晋军统帅胥甲、赵穿提出的“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

也”(《左传·文公十二年》),就与“四不主义”同出一辙。胥甲、赵穿反对“不待期”,就是反对乘秦军约期明日交战而利用当天夜间实施突袭。反对“薄人于险”,就是反对进迫秦军背靠黄河,乘其后退无路而聚歼之。

这种处险不薄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将帅中,而且在士兵中也普遍地存在。晋楚邲之战是一次大战,楚军提出了“宁我薄人,无人薄我”与“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宣公十二年》)等新的作战思想和新观点,因而,楚军大胜晋军。但是同是在这次战争中,当晋军战车坠入坑陷不能进,战马盘旋不能行时,楚军士兵却教晋军如何用车使马摆脱困境,放其逃跑。

总之,按照军礼就应对敌人尚信而非诈,所谓“凡战:因时,贵信”、“古者,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

因此,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在奴隶制时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它是军礼规范的战术原则之思想基础。但随着装备进步、战法变化,“重偏战而贱诈战”已不适应战争发展,逐渐走向没落。而宋襄公无视这一变化,拘泥于古法教条,败亡不可避免。泓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这时一些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已开始批判僵化保守的奴隶制军礼了,如同宋襄公正面论战的司马子鱼,他是解放这一作战思想的先驱者。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孙武才全面地批判、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完成了奴隶制军事思想向新兴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转变。

二、“围师遗阙”是春秋兵家思想的渐变

需要指出的是,“围师必阙”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版本。银雀山汉简本“必”作“遗”,“围师遗阙”。“必”,必须留下缺口;“遗”,虚留缺口。从当时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带来战争发展变化看,孙子绝不是主张包围敌人时要留出缺口,放跑敌人,只能是虚留生路,最终目的是消灭敌人。一字之差,相差千里,银雀山汉简本更符合春秋末年的作战思想的变化。所以,孙子强调,对于撤退的敌军不要去正面拦截,包围敌人要虚留缺口,濒临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这是用兵的法则。

其实,在宋襄公之前,就已经有军事家看到

了西周军礼的弊端,看到了教条用兵的过时,大胆提出了新的作战思想,并付诸战争实践,成为一种新的军事思想萌芽。举两个例子,一是长勺之战,二是繻葛之战。

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齐国进攻鲁国,鲁庄公迎战。鲁国人曹刿看到齐军强、鲁军弱,就劝阻鲁庄公,应先让一步,敌疲再打。鲁庄公采纳了这一建议。齐军第一次击鼓出击,鲁军坚守阵地。第二次击鼓,鲁国仍坚守阵地。齐军以为鲁军怯阵,于是第三次击鼓出击。曹刿认为,齐军三鼓而竭、攻势已衰,而鲁军此时攻势正旺,于是建议鲁庄公迎战。结果,鲁军一鼓作气,大败齐军。鲁庄公准备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辙,然后登上车远望,说:“行了。”这才追击齐军。战胜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能取胜?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辄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全文引用了左丘明对长勺之战的论述,接着又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他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2]203}其实,之前作战双方都是以鼓为令,按照一鼓、二鼓、三鼓出击,所谓“堂堂正正”。然而曹刿呢,占据有利位置、把握有利时机,一改传统作战思想和方式,突然出击、出其不意,齐军一击而溃。

公元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郑庄公采取大夫公子元的新战法,将军队布成“鱼丽阵”,迎击周桓王的军队。鱼丽阵一反“斗一守二”的布阵常法,而是布成“斗二守一”的倒“品”字形战阵。作战结果表明,郑军“斗二”的左右方阵部队率先从两翼突击,郑军右翼小方阵攻击周军左翼的陈国小方阵,郑军左翼小方阵攻击周军右翼的蔡、卫两国小方阵。周军左、右两个方阵的军队战斗力不强,遭此突然打击,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主力也乱了阵脚。郑军左、右两军转锋卷击桓王中军,郑庄公所率中军也乘势投入战斗,桓王中箭负伤,周军大败。这就如同渔网一样,使

周桓王的军队钻进了渔网,进了口袋。结果,渔网一收,周桓王的军队就成了“网中之鱼”。

在这之前,典型的“品”字阵是一个攻阵在前,两个守阵在后,也就是《孙膑兵法·八阵》所说“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公子元改变以往方阵,形成了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作战方式,体现了兵家作战思想的逐渐变化。再比如,北朝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齐神武起兵于河北。朱兆、天光、度律、仲远等四将同会邺南,号称二十万,围神武于韩陵山。当时,神武有马匹两千,步卒不满三万人。朱兆有意网开一面,留出生路,以便待机而歼。神武识破敌人诡计,把牛驴串联起来,堵塞阙口,显示死战决心。全军将士身陷死地,为了求生,人人振奋,奋勇杀敌,终于取得了胜利。

三、“围师无阙”是战国之后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春秋末期,孙子彻底否定了奴隶制那一套僵化落后的作战思想。他认为,作战的根本原则是对敌人广施诡诈,而不能讲半点所谓的仁义道德。因为他看到,战争既然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子兵法·计篇》),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就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书呆子气。他明确提出“诡道十二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其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他更直接指出:“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蹙。”(《孙子兵法·九地篇》)在孙子笔下,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被扫荡无遗。

在作战指导上讲求诡诈,从本质上说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同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比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要深刻得多、激烈得多、残酷得多。孙子的高明杰出之处就在于他是站在时代前列正面指导人们向前看,而当时一些囿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的思想家则总是对过时了

的一套舍不得放弃,抱残守缺,无限留恋,甚至为之辩护。比如孔子对于宋襄公的战法就是赞扬的,他认为宋襄公是“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三子者出,曾皙后。……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之所以对仲由冷笑,就是因为仲由不讲周礼。毫无疑义,这与孔子主张“军旅有礼,故武功成”(《礼记·仲尼燕居》)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他在军事思想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上保守性的反映。

儒家学派在作战思想上越是主张所谓以德服人,在作战上也就越是远离权谋诡诈。这一点,不仅与孙子同时的孔子是这样,而且在孙子之后的儒家信徒们也是这样。战国时代的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荀子也主张“不潜军”(《荀子·议兵》)。甚至到了秦汉以后,竟还有一些儒家之徒公然诋毁孙子。例如,宋人高似孙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子略》)殊不知高似孙所肯定的恰恰是历史所否定的,而他所否定的正是历史所肯定的。这些人不过是军事学术史上的申公豹,是反脑袋,总是向后看。到了宋代,这类在军事上傻气十足的儒者还大有人在,以致掀起一股重文轻武之风,葬送了宋朝江山。

孙武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功绩是不容低估更不容诋毁的。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绩时,列宁曾提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154}的原则,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

孙子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成就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以春秋初期的公元前718年郑卫北制之战采用迂回攻击、公元前714年郑抗北戎采用

伏击打法、公元前 707 年周郑繻葛之战采用钳形攻击等几个著名战例为新的作战指导思想萌发的标志,那么,到孙子新的作战思想体系的建立,大约经历了 200 余年的时间。班固说得好:“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孙子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功绩就在于他既全面地、系统地、批判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为后人奠定了继续向顶峰攀登的牢固基石。

可以说,孙子是中国军事学术史上,也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天才地提出“兵者,诡道”和“兵以诈立”著名论断的军事学家。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很简单,但是,当我们追溯一下春秋以前奴隶主阶级的作战思想之后,就会清楚地看到,它在当时无异于沉云密布的天空中出现的一颗明星,使茫茫黑夜中的人们看清了世界的面貌。这一作战理论的提出不仅在中国作战思想史上,同时也在世界作战思想史上树立起了一座丰碑,是作战思想史上的一次解放和创新。300 年后,韩非子把它发展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于是,“兵不厌诈”便成为战争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和颂扬孙子是春秋时代作战指导思想解放的先驱,是春秋时代集大成的兵家的时候,也不能把夏商周时代的作战指导思想一笔抹杀了。奴隶制的军礼反映了奴隶主阶级虚伪、欺骗民众的一面,也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在腐朽没落时期作战指导思想保守僵化的一面。但是,从整个奴隶制时代的作战指导思想发展史来看,它也同样有着灿烂的奴隶制时代的军事文化,其中包括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创新和进步。让我们引几则《周易》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记述,就可窥见一斑。《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这是说的设置伏兵,并抢占有利地形的作战行动。又如,《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这是记述敌人实施突然袭击,进行烧杀抢掠的情景。伏击、突袭都是高明的作战指导,也是诡诈的作战行动。事实上,人类从蒙昧时代的原始战争开始,就具备了迂回、伏击、包抄之类的作战指导意识,而这些意识又是人类从狩猎中积累总结的斗争经验。

到了战国,很多战役都是歼灭战,“围师无

阙”也成了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 259 年,秦与赵相拒长平(今山西省高平西北),赵王派廉颇为将迎击秦军。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派奸细散布说:“秦国最害怕的、最担心的是让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赵王误信秦国奸细的话,用赵括为将,取代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他父亲的兵书,并不懂得因敌变化的用兵之道。但赵王不听。赵括代替廉颇之后,把廉颇对军队的规定约束全部废除,又任命新的官吏。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不懂指挥的弱点,采取诱敌入伏、分割包围然后予以聚歼的方针,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 40 万人。

四、“追歼穷寇”是实现战争胜利的最终要求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4]758} 歼灭战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直接体现,也是实现战争胜利的最终要求。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始终把歼灭战作为作战指导思想的重要观点。1936 年 12 月,他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确立了歼灭战思想。他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强了我军的力量。”^{[4]758} 1938 年 5 月,他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5]504} 为什么是歼灭战? 他在 1946 年 9 月指出:“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

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6]483}

把歼灭战作为基本作战方针,也是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历代战史中汲取智慧的重要体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能进行作战的兵力仅146万,濒临绝境,而我军达到358万人,在兵力对比和总体局势上形成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专门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提出:“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7]466}。1949年4月2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抓住时机,毛泽东又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7]549}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福建和中南进军,果断实施了渡江作战。23日,我军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得到消息后,思接楚汉之争,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8]74}

为什么不能学霸王?因为当年项羽拥有四十万大军强势入关,没有杀刘邦,楚汉相争局面形成。毛泽东此时自然想到:项羽是一个不能将

顺利进行到底、不能乘势而上的将领,是一个优柔寡断、沽名钓誉的将领。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四十万大军乘势消灭刘邦,刘邦则不会有喘气的机会。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1951年5月26日,他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9]490}总之,打歼灭战,就是一口一口地将对手吃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战争力量的对比。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大创造。如美国战略研究家柯林斯指出:“中国主张的‘歼灭战’,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作战原则中是没有的。”^{[10]61}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独有的“歼灭战”,才使敌强我弱变为我强敌弱,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歼灭战,不等于将敌人全部杀光,不等于完全消灭敌人的肉体,那变成西方的狩猎主义了。歼灭战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使敌人意志屈服。同时,一个个战役上的歼灭战不是战争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战略全局的胜利。

总之,从“围师必阙”,到“围师遗阙”,到“围师无阙”,再到“追歼穷寇”,层层递进,是一个不断发展过程。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特别是作战思想的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军事文集》编写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毛泽东军事文集》编写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毛泽东军事文集》编写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7]《毛泽东军事文集》编写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 [10]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Surrounding an army must leave a gap” and “surrounding an army without leaving a gap”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mbat guidance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bjectives

HAO Jingdong, WU Rusong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hapter “*Tactical Maneuvering*” in *The Art of War* states that “surrounding an army must leave a gap”, which emphasizes that encircling enemies requires leaving a gap. In the Han bamboo slip version from Yinque Mountain, the character “Bi” (must) is written as “Yi” (leave). The character “Bi” emphasizes a gap must be left, while the character “Yi” emphasizes a virtual gap can be lef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i” and “Yi”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military thought.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ombat guidance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bjectives reveals that “surrounding an army must leave a gap” is a legacy of the military ritual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surrounding an army can leave a virtual gap” represents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urrounding an army without leaving a gap”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warfare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pursuing and annihilating a retreating army” is the ultimat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the victory of war. At the present,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is evolution of combat ideology still ha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achieving military objectives, preserving one’s own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morale, exploiting the enemy’s combat capabilities and morale and ultimately securing the victory of war.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military objectives; surrounding an army must leave a gap; surrounding an army can leave a virtual gap; surrounding an army without leaving a gap; pursuing and annihilating a retreating army; combat guidance ideology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郝敬东,吴如嵩.“围师必阙”与“围师无阙”:从军事行动目的看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1):10-16.

HAO J D, WU R S. “Surrounding an army must leave a gap” and “surrounding an army without leaving a gap”: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mbat guidance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bjectives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1): 10-16.